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王志乐

本期特稿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强调“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丰富了开放发展新思想,必将为我国的改革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清晰地表达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开放发展方面的新思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开放发展,应结合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上勇探新路,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一、坚持开放发展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挑战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五中全会《建议》把“开放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强调“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1979年对外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集中体现在对外开放,引进跨国公司投资。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国一共引进15000多亿美元外资。这些外商投资以资金为纽带,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产品,而且带来了现代的管理体系和创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促进了我国现代企业的发展、现代产业的形成以及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带来了全球市场竞争新方式和新规则,促进了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路径,从而促进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功为世人瞩目。

然而,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却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美发达国家调整本国经济发展思路;有的加大“制造业回归”,鼓励制造业在本国发展;有的推进现代制造业发展,包括推进“工业4.0”;有的推进更高标准、更高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例如TPP和TTIP,重构全球经济版图。发展中国家则借助制造业成本优势加大吸纳外国资本,例如东南亚一些国家,形成与中国竞争的新格局。

令人遗憾的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对我国开放发展趋于严峻之时,一些人是否坚持开放发展出现了质疑和摇摆。事实上,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一直存在两种思维和两种政策的博弈。引进外资是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各个重要关头,对于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提出批评和质疑。迄今为止一共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争议。

1、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争议的焦点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参与了我国最初的引进外资的工作。他回忆上

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时写道,北京引进外资建立合资饭店招来许多批评。有人认为“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李岚清认为“当时所争论的还不仅仅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了”。

2、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争议的焦点是“姓资姓社”

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苏联解体等国内外事件对我国带来重大影响。一些人质疑改革开放,认为利用外资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一关键时刻,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3、2001年前后争议的焦点是“人世还是不入世”

当时一些人认为,加入WTO,将是中国产业遭受外国公司的冲击,中国的各个产业和企业将被冲垮,因此反对中国加入WTO。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入世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外资企业全面进入中国,而中国本土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各个产业迅速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在全球的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和在华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人们再次对于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作用产生质疑和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市场换技术战略失败;认为外商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这些批评的一个焦点在于如何定位外资企业,批评者认为外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而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企业。这些批评和质疑影响到有的政府部门在对外资政策上出现了摇摆,例如对外资企业是否自主创新企业的认定,以及政府采购等方面出现了排斥外资企业的做法。

因此,现在面临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如何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此推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坚定不移地坚持开放发展

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吸收外资给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宝贵的管理经验、众多的国际化人才,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明确提出了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方面不变。

9月22日,习近平到达此次访美第一站西雅图。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演讲时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根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再次明确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方面不变。在华盛顿与奥巴马会谈时,习近平又一次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

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外国企业今后在华投资兴业,将会有更为开放、宽松、透明的环境”。

11月18日,2015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主旨演讲,再次强调:“我们将更加注重对外开放,加快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与各方一道尽早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习近平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多次强调和重申中国的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方面不变,对于我国坚持开放发展战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正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阻碍开放的错误思潮进行纠正,坚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完全吻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之时,中国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市场出现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之时,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之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放眼全球,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如中国这样把外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潮流结合的如此紧密如此合拍。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同步发展,我们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实现了以和平的公平的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添添了崭新的一章。

习近平重申中国外资政策、外资权益保障和为外资提供服务的方向三个方面不变,体现了中央坚持和延续了35年来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纠正了近年来在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问题上出现的舆论混乱和一些政策摇摆,将对我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强有力的推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讲话不仅提出外资政策等三个不变,而且明确提出要在现有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提高开放的水平。9月23日,在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发言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美双方正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协定将在更大程度上放松中美市场准入限制,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这符合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方向,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显然,今后五年开放发展不是过去对外开放的重复,而是在过去30多年开放发展的基础更高水平的开放。

三、通过理论创新推进开放发展

坚持开放发展需要创新开放理论。事实上,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创新和正在创新着一系列有关对外开放的理论。

加强预警,当好企业风险“管家人”

今年,江东区国税局面向区内企业推出了出口安全服务。出口退税安全服务是江东区国税局针对外贸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容易遇到而又模糊不清的涉税风险,进行事先、事中、事后提醒预警服务,从细节入手,用案例说话,让企业更直观了解掌握规避涉税风险的方法和技能,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注重关键节点和关注商品的提醒服务,如上年度出口货物未及时申报,未备案反提醒等。该项服务自推出以来,已累计服务企业300余家,发送短信提醒5000余条,逐步引导和帮助企业建立了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

为切实防范涉税风险,区国税局高度重视调查评估环节,由调查评估岗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工作职责,对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的企业和出口不退税货物、出口转内销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实地核查,核实企业基本情况、经营场所、人员配备、财务制度和单证准备等内容,根据核查情况研判风险,对正常企业予以退税,对《退税规范》规定有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和审核过程中

跨国企业是我国对外开放涉及的企业主体。跨国公司理论亟需创新。跨国企业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主要对象,但是传统的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这一理论一直影响人们对现代跨国公司的认识,成为对外开放不时出现摇摆的理论根源。现在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成为走向全球的跨国公司。按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显然也难以正确解释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的地位与作用。显然,坚持开放发展需要理论创新。

其实,从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来,跨国企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他们从过去的跨国经营转变到全球经营,他们的管理结构则从中心辐射式管理转变为全球网络式管理,他们承担的责任也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承担经济、社会和环境以及合规的全面责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海外经营规模超过了总部所在国。跨国公司正在转变为全球公司。全球公司与投资所在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进而构建了利益共同体。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公司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例如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对中国信息安全带来的隐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型跨国公司即全球公司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助力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助力我国和平崛起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对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访美期间举行了中美企业家座谈会,IBM、波音、微软、思科、通用汽车、苹果、沃尔玛、福特汽车等20余家美国著名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参会。在座谈会上,习近平高度评价两国工商界长期以来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四、通过观念创新推进开放发展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主要是一个投资输入国,对外投资还很少。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不同,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已经与引进外资持平,对外投资实际数量已经超过引进外资,中国即将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已经进入了投资输出与投资输入平衡的“新常态”,而这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

30多年来我国民众和一些政府官员形成的基本上投资输入国思维。投资输入国关注如何保护本国产业以及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因此往往对外资准入、股权比例、投资期限、利润转移等问题加以管制或限制。而投资输出国则关注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与收益,要求投资输入国开放市场、给本国企业投资以国民待遇,加强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投资输入国思维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体系,显然难以适应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出现的这一历史性转变,也难以适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

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开放,中央不仅坚持外资政策不变和扩大引进外资的领域和规模,而且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

出去,从过去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转为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

今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强调,“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指出要“大力培育开放主体。完善国有资本对外开放的监管体系,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协作。支持国内企业吸纳先进生产要素,培育国际知名品牌,增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换言之,我们不仅要引进国外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而且要培育源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更加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五、通过措施创新推进开放发展

习近平关于开放发展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五中全会《建议》,不仅在开放战略理论与开放发展观念作了全面创新,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和具体措施,为今后推进开放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其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新布局

具体措施包括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其二、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其三、深化两岸三地合作新发展

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

其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权利与义务对等,加大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必然要承担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综上所述,坚持开放发展涉及开放理论、开放观念、开放措施等全方位的创新。我们相信,在未来5年里,中国一定能够继续坚持和深化开放发展,并且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一起,推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国税优质服务助出口退税“再加速”

□汪颖

实践与思考

《全国税务机关出口退(免)税管理工作规范(1.0版)》和《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的实施,是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具体行动,为今后一个时期出口退(免)税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江东区国税局通过规范退税分类管理、贴心讲解辅导、搭建信息平台、实行退税安全机制等多元化举措,不断提升企业满意度,优质服务助出口退税“再加速”。

进门入户,送推辅导两不误

结合江东区国税局“服务企业+”工程,区局领导与出口退税业务骨干密集开展了“退税进企送服务”活动,先后走访了宁波宁电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华艺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敦煌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区内重点进出口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和当前的进出口贸易形势,认真听取企业在进出口贸易经营中与出口退税相关热点和难点问题,

积极跟进后续举措,并向企业及及时推出口退税新政策,耐心介绍加速出口退税的各项措施,为区域外贸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针对今年退税新政的实行和退税新系统的上线后企业日常申报面临的诸多难点,通过蒲公英纳税人学堂的实体课堂和网络课堂密集举办了多次出口退税业务辅导会,进行政策讲解和系统实务操作示范,辅导企业尽快适应、及时了解、熟练运用新规范和系统,提高退税效率,提升企业满意度。

此外,区国税局联合区外经贸局,配合百丈、东柳等街道,对街内外外贸企业老总进行政策宣讲,介绍全区出口退税情况及退税规范1.0和分类管理办法的实施情况,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对有意见入区的外贸企业进行上门政策辅导,介绍江东区外贸环境及相关的优惠政策,积极促进该企业落户江东。

截至2015年10月份,江东区国税局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45.5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1.72亿元,同比增长34.6%,位居全市第三。共办理出口退税资格认定企业1153户,同比增加15%,在今年经济下行

趋势的压力下,区国税局通过规范退税管理、实行分类管理、搭建信息平台、实行退税安全服务等措施,推进了区域外贸经济增速发展。

分类分级,不同企业“不一样”

今年以来,江东区国税局对已认定的1153户出口企业进行了分类分级,逐户定级,并将定级为一类的3户出口企业列为重点服务对象,指定专人管理,提供绿色通道,受理后第一时间电话告知核准岗先行审批,退税时间优先办理,做到一类企业出口退税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办理,实现出口退税速度大飞跃,同时引领二、三、四类企业积极提高纳税遵从度,积极向一类企业方向发展。对信誉较差的四类出口企业,严把审核关,要求提供原始凭证、收汇凭证,加入增值税专用发票辅导,核查信息审核办理、纸质资料逐笔人工审核等环节,且每户供货企业都要抽取一定金额的进项发票发函调查,年度至少进行一次退税评估。

《分类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区国税局已累计为一类企业办理退税16笔,累计退税13572921.42元,平均每笔业务提速18天。

加强预警,当好企业风险“管家人”

今年,江东区国税局面向区内企业推出了出口安全服务。出口退税安全服务是江东区国税局针对外贸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容易遇到而又模糊不清的涉税风险,进行事先、事中、事后提醒预警服务,从细节入手,用案例说话,让企业更直观了解掌握规避涉税风险的方法和技能,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注重关键节点和关注商品的提醒服务,如上年度出口货物未及时申报,未备案反提醒等。该项服务自推出以来,已累计服务企业300余家,发送短信提醒5000余条,逐步引导和帮助企业建立了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

为切实防范涉税风险,区国税局高度重视调查评估环节,由调查评估岗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工作职责,对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的企业和出口不退税货物、出口转内销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实地核查,核实企业基本情况、经营场所、人员配备、财务制度和单证准备等内容,根据核查情况研判风险,对正常企业予以退税,对《退税规范》规定有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和审核过程中

有疑点的企业开展发函调查,并根据核查结果确定退税业务办理流程,从严把控出口骗税风险,将退税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江东区国税局积极落实国务院取消出口企业退税资格审批的政策规定,企业只需在申请出口退税前履行备案手续即可。用“互联网+”思维再造退税流程,减少人工审核,取消纸质单证报送,大力推广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以生产型企业出口退税单证无纸化申报系统为依托,精简企业申报环节。通过区局外网、公告告示、网络QQ群等多途径向区内的出口企业发布文件政策和各类最新通知,以便企业及时了解、掌握、运用,尤其是今年向企业传达了新的《分类管理办法》对不同类型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管理服务措施。

下一步,区国税局将继续跟踪前期退税实践,收集反馈,大力开展退税安全服务,并根据纳税信用等级复评相关结果及时更正企业退税管理类别,努力为企业外贸经济再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江东区国家税务局)

观点聚焦

热议“供给侧改革”

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什么是“供给侧”?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释放哪些新红利?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供给侧改革有哪些新内涵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指出,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总体而言,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供给管理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显然,供给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需求管理。

原本以需求管理为侧重点的理论和与之匹配的调控框架,现在需要引入更多供给侧的分析与认识,积极实行理性的供给管理。而供给管理范围内的政策设计内容相当丰富,也更具挑战性。

从供给端入手推动制度创新,是有效化解“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当前必须在供给方面考虑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动力。供给方面大致有五项要素:劳动力、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量、制度机制安排。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的动力作用非常明显,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更需要强调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升有效供给必须有一系列改革的重点考虑。比如,简政放权必须结合体制框架的改造,指向大部制、扁平化,才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潜力和活力。

供给侧改革不能否定“三驾马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供给侧改革是相对于需求侧改革的措施,更侧重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更侧重增强企业长期发展的活力,更注重经济长期持续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是扩张经济总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就是提高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这作为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供给侧改革提法与“三驾马车”是否替换关系?这个说法不正确。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是同时存在的,转向供给侧以后就更应强调不要纯粹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不要光做需求的文章。供给侧强调的就是通过重新配置资源的配置来提升供给,但并不是说需求不重要了。有人说“三驾马车”理论不正确,这是不懂经济学的表现。

供求是双方面的一种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也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以创造出新的需求。总的来讲,解决供给问题的同时,也是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种新的需求更可靠、更实在、更具有可持续性。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在《文汇报》刊文说,供给侧动力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是现代增长理论。凯恩斯革命后,经济学的最重要发展之一,就是现代增长理论。

现代增长理论揭示的增长源泉,或者说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经济学家索洛首先指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经济学家罗默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激励,所以技术进步是内生的,由此产生了内生增长理论。其二,如果从要素投入角度观察现代经济增长,人们发现,人力资本既替代劳动,也替代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其三,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创新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并将其作为供给创造需求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学中,熊彼特创新是要素和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进步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新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里入手?我们从观察到的一个“奇怪”现象说起。一方面,符合市场需求创新成果有限;另一方面,技术不断创新有着极大催生作用的风险投资却“过剩”了。原因何在?显然,好的创新创业项目不足,最终是能够提出并实施这些创新创业项目的“人”不足,是症结所在。

这里,“人”是自然人,也是法人。创新创业行为可以是自然人所为,也可以是法人所为。因此,聚焦于和“人”及“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改革。譬如,教育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当我们对阻碍、甚至禁锢新的增长动力形成的这些机制和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时,重点就在这些领域。为此,应当以“形成新增长动力”为聚焦点,进行相关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或系统设计,再具体落实改革任务,以期在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方面有明显的改善。

(李伦)